

“长征四老”的故事



在红军长征队伍中，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人居多。但在这支年轻的红色队伍中，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长征四老”。他们是红军中4位鼎鼎有名的老同志：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1934年10月，“四老”跟随中央红军踏上漫漫征程。其中，徐老、谢老、董老编在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林老担任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部长。长征途中，他们处处以身作则，与官兵同甘共苦，给年轻的红军战士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与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一起，在敌人重兵的围追下，意志坚定，不怕艰苦，战胜了饥饿、疾病的折磨，走过万水千山，走过雪山草地，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

徐特立： 年龄最大的“怪老头”

徐特立，1877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徐特立先后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湖南孤儿院和延安自然

科学研究院等各类学校，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田汉等都是他的学生。

长征途中，徐老常常利用行军路上和宿营间隙，教战士们识字读书，在异常艰难的行程途中，带给战士们知识的营养和学习的乐趣。

据专门负责徐特立等老同志行军安全的郭德琳回忆，大家把徐特立亲切地称为“怪老头”：看到别人扔掉的破草鞋，他就会捡起来，有空时洗干净、拆掉，把草条捆挂在杆子上挑着走。看到周围谁没有草鞋或者草鞋太破了，他就给人家一捆草条打草鞋。

谢觉哉： 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

谢觉哉，1884年出生，湖南宁乡人，清代最后一科秀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50岁的谢觉哉参加了长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随身带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认为，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艰难，将来总还用得着。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也扔掉了，但印章却保存着。

许多年后，当有人请谢老讲长征的艰苦生活时，他说：“当时，看样子是苦，但心里充满希望，坚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甘与苦都是比较而言，快乐常常不在艰苦之后，而在艰苦之中。”

林伯渠： 夜行军中的老英雄

林伯渠，1886年出生，湖南安福（今临澧）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3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经济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时，他担负着筹粮筹款的重任。

他在长征中的形象，随着黄镇那幅《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绘画而深入人心：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同志，黑夜中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拄着手杖，大步前行，一位老当益壮革命前辈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

董必武： 妇女队的“胡子队长”

董必武，1886年出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共一大代表。1934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

长征时期曾任董必武勤务兵的钟珠瑞回忆，董老有两块油布，一块披在肩上挡雨，一块搭在马背上遮书籍，因为他深爱自己的书。董老俄语很好，战斗间隙经常研读俄文版马列著作，又读又背，中间还用小楷毛笔批注。过雪山时，董必武曾经两次把自己的马让给钟珠瑞骑。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阿斗乐不思蜀吗？

蜀汉亡后，刘禅移居魏国都城洛阳，封为安乐县公。某日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嘱咐演奏蜀乐曲，并以歌舞助兴时，蜀汉旧臣们想起亡国之痛，个个掩面或低头流泪。独刘禅怡然自若，不为悲伤。司马昭见到，便问刘禅：“安乐公是否思念蜀？”刘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也。”司马昭见刘禅如此老实忠恳，从此再也不怀疑他。刘禅就这样在洛阳安乐地度过余生。而这就是乐不思蜀这一典故的来历。

或许很多人对于这个故事已经很熟悉了，而且也已经默认了刘禅是个乐不思蜀的人，也认为刘禅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段历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那我们来拨开历史的浓雾来看看历史的真相！

刘禅从公元223年登基，至公元263年降魏下台，称帝在位共41年，是在三国时期所有国君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在那群雄割据、兵连祸结的战乱年代，能执政这么久，没有相当的才智是不行的。有人把刘禅安稳地做皇帝归因于诸葛亮的辅佐。其实，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他死后，刘禅还做了29年的皇帝，很难说成是全凭诸葛亮的辅佐之功的。

在人事任免上，刘禅表现出过人的一面。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力太重，刘禅废除了丞相制。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以管政务为主，兼管军事；费祎以管军事为主，兼管政务，军政及内政大权不再同一人一把抓。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决不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一人，而自己则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

话说曹魏兵围成都，刘禅心里很清楚要是抵抗，士兵的伤亡一定会很大，而且很有可能招致曹魏屠城，让百姓遭殃。为了保全子民，刘禅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开门投降。刘禅投降后，北上到达洛阳，被封为安乐公。这样一来，刘禅多了一个卖国的骂名，却保全了百姓的性命财产，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对于刘禅不战而降，实乃“全国为上之策”。

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刘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对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某个西方的著名文学家说过：“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在刘禅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隐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

摘编自环球网

西南联大： 只存在8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巅峰！

民国烟云

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课程设计

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1937年8月28日，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长沙失陷，联大师生经过数月跋涉，1938年4月28日抵达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

联大在匆忙中开课。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闻一

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

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管理自由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

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

校长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育才育人

联大办学8年，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可见考试之严格。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

3882名毕业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大师。西南联大之奇迹，不在于他拥有大师，更在于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

联大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大师，不仅仅在于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更在于他育才育人的理念。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

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摘编自历史网